

秦
颖著

貌相集

影像札记及其他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秦
颖
著

貌相集

影像札记及其他



Copyright © 201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貌相集：影像札记及其他 / 秦颖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5

ISBN 978-7-108-05434-0

I. ①貌… II. ①秦…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82118 号

特邀编辑 吴彬

责任编辑 王竞

装帧设计 薛宇

责任印制 徐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金舵手世纪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15.5

字 数 208 千字 图 61 幅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45.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序

俗话说人不可貌相，意思是说以外貌评判一个人并不全面。本书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互相发挥，取名“貌相集”，既是想指明图片或文字自身的局限，也是想强调这只是我的视角、我的看法，而非全面深入地研究和展示。

这本书出发的原点是镜头。不记得是哪位摄影家说过：照片本身就是一个事件，一种经历，而不仅仅是对照相机前所发生之事的记录。但照片作为视觉“真相”，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我珍视这些照片，它记录了作者生命中的一个瞬间，也多少保留了部分环境、生活、岁月留下的个性化特征。书中的文字记录了我与这些人物的交往，无论是一面之缘，还是持续几十年的忘年交，对我都是珍贵的记忆。希望这一组文字，能拓展镜头的视角，将照片的主观视觉深化，从某个侧面展示他们的性情、修养、学问，等等。

美国出版家舒斯特说过：编辑不仅仅是一个充实人生的职业，编辑本身也是一种人文教育，你因此有机会和当代最有创造力的一群人认识，结交作家、教育家以及各种各样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你等于在修一门你愿意付费的终身学习课程，不同的是，你修课的时候不但领薪水，而且还可以在知识和心灵上得到充实和满足。这组图片和文字可以作为这段话的注脚，它对我的意义则是：这是我编辑生涯，特别是主持《随笔》杂志几年的部分答卷。

从业近三十年，认识、结交的文化界、思想界、文艺界、学术界、科学界人物无数，跟他们的交往，成为我人生难忘的经历。还在七八年前，友人见我积累的肖像摄影颇可观，建议我将照片整理出来，配上文字出版。从《随笔》离任时，就想启动这事，还给一些作者写了信。不想杂务繁多，加上天性拖沓疏懒，使得这事一拖经年，直到二〇一一年才开始陆续整理资料，包括二十余年编辑生涯留下的零散记录和通信。二〇一二年年初开笔后，并不顺利，许多篇什从资料准备到写成，几经打断，反复重来，个别篇什前后拖沓一年有余。父亲知道我的懒散，总是以很委婉的方式提醒：抓紧时间写。但几年下来陆续写得的也仅四十余篇。还是听从了友人建议：将现有的篇什结集，其余的慢慢来。于是有了现在的集子。

本书收录了我拍摄的何兆武、朱正、钟叔河、王元化、何满子、周有光、舒芜、贾植芳、严秀、流沙河、李普、李学勤、黄裳、萧乾、牛汉、宗璞、莫言、杨宪益、葛浩文等四十余位学者、出版家、作家、翻译家的肖像作品，并撰写了影像札记。全书依姓氏笔画排列，肖像作品原则上一人一图，另外适当收录有特别意义的合影，图片总计约六十幅；文字部分，短不足千言，长则近万字，随兴而至，尽兴即止。

是为序。

秦 颖

2015 年元月 4 日

目 录

序 | 1

王元化 | 1

王养冲 | 7

牛 汉 | 11

忆明珠 | 17

冯骥才 | 19

朱 正 | 23

朱厚泽 | 35

朱 健 | 39

孙道天 | 43

汪澍白 | 47

李 普 | 51

李冰封 | 57

李学勤 | 61

严 秀(曾彦修) | 67

苏福忠 | 71

邵燕祥 | 79

吴 江 | 83

张 鸣 87	萧 乾 193
张思之 91	黄 裳 199
何兆武 93	黄一龙 205
何满子 103	黄宗江 209
陈乐民 107	葛浩文 211
陈丹青 111	舒 芜 217
沈昌文 117	翟永明 223
周有光 123	缪 哲 227
宗 璞 135	薛忆沩 237
杨宪益 139	
姜德明 149	跋 242
钟叔河 151	
莫 言 163	
流沙河 167	
贾植芳 171	
耿 庸 175	
高 健 179	
高 莽 185	
章 明 189	

王元化

不知道为什么，给王元化先生拍摄的一组照片中，我总觉得这一张有说不清的丰富：紧闭的双唇，瞪大的眼睛，不太轻松的神情，还有后面的鼎，投在墙上的影子，隐约可见的缠绕的连线……所有这些似乎都在展示作为思想者、学者、政治家的王元化。

多年前我跟朱正先生一起编“思想者文库”，在拟定第一辑作者名单时，首先想到的是王元化先生。收到我们的约稿信后，王先生回复道：作品大多已经结集出版，手头没有新作，不主张重复选编。当时拜识王先生并当面聆教的机缘尚没成熟。

2004年年底，我到《随笔》后，更加关注王先生的文字动态，在《新民晚报》偶尔可看到他的一些文章，暗下决心，一定要想办法请到他再为我们写稿。2005年4月准备到上海拜访作者，行前作了一些准备，给王先生写了一封信，表示要登门拜访。抵沪后的4月18日晚，用手中那个多年前的电话号码试着拨通了电话，得知王先生常住庆余别墅，并建议第二天上午打电话过去约见。第二天下午三点，按约好的时间，我们准时到了庆余别墅。

王先生住一个套间，敲门进去，他坐在外间客厅靠窗的环形扶手靠椅上向我们打招呼。我们在他对面坐下。王老很热情，谈到广东和湖南的一些老朋友，谈到当年在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启蒙》丛刊惹了一些麻烦，让李冰封先生受累，很过意不去。这是王元化先生真情的流露。



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乃至一直持续到世纪末的思想启蒙，王元化是不能绕过的人物。办《新启蒙》是他用力甚大、付出极多的一件事。据魏承思先生的回忆：“大约在1988年年初，一次在先生家中聊天时……他提议我们自己来办一份读物，仿照1950年代的《新华活页文选》，每一辑三两篇文章，不要封面，低成本低售价地发行。这份读物既不是时评性的，也不是纯学术性的，而是从文化角度来探讨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新启蒙”在王元化先生这里还有一层意思。办《新启蒙》时，是王先生思想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了，他反思的主要问题是：启蒙思想到了后来形成了一种倾向，就是过分相信理性的力量，过分相信人的力量，缺乏一种怀疑精神。王先生故世后，他的学生整理了《王元化谈话录》，王先生说：“人的认识是一种真实的反映论吗？我怀疑。我觉得人类认识，不是一个绝对的东西，这是我的最根本的一个命题。所以我觉得这个启蒙学派，把他认识到的就认为是一个绝对真理，他认为就是他掌握了。他一旦掌握了绝对真理，他就非常大胆和独断，因为他不是为了个人的一个东西，他是为了真理，做出很残暴的事情。这是我的第三次反思的核心。”

话题转到了《随笔》，自然要向他索稿。王先生说身体不好，尤其眼睛不行，已经写得很少，偶尔有些短文，在《新民晚报》上发，也是通过口述，别人记录，然后念给他听，再反复修改。大概是先生有感于我们的诚意，谈话间提及手上正好有一篇《谈〈四代篇〉》，千五百字左右，过几天还会有一篇，若《随笔》想用，可拿去放在一起发，只是前一篇《新民晚报》已拿走，不知何时刊登，担心坏了《随笔》首发的规矩。当时离第三期出刊不到二十天的时间。我当即表示，我们要了，可以把后一篇作为主体，加上发表的时间很近，覆盖的读者群体也不一样，即使是晚报在我们前面出来，也不能说是破坏了首发原则，不会造成一稿两投的印象。于是，2005年第三期上，有了久违的王元化先生

的文章：《清园随笔二则》。

他起身取了一本《思辨录》送我。我知道，谈了这么久，王先生已经累了，得告辞了。征得他的同意，我拿出照相机拍照。时序还是早春，天黑得早，近5点时分，室内已经相当昏暗。王先生在原位坐好，我来不及细想，用闪光灯的反射光，拍了十几张。拍完了，王先生说有一个朋友给他拍过一张，他比较喜欢，拿出来给我看，说如果要用可拿去。2005年第三期开始，《随笔》试着在文章中发一幅作者近影，我给王先生拍的一幅用在了文中。在之后《随笔》作者的走访中，这张照片被不少老先生提及。

回来翻看《思辨录》，知道其中摘编了先生六十年来陆续所写文字，内容涉及思想、人物、历史、政治、哲学、宗教、文艺、美学、鉴赏、考据、训诂、译文校订等各个方面。这已是第四次编订，“内容增加了将近一半，全书收文三百七十七则，要算各个本子中收罗最全的一个本子了”。先生将之作为“定本”，“因为按我的体力、精力来说，今后不可能再写出更多文字，再作新的增补了”。这是一生思辨的精华，先生送我此书，当是对我这个“新手”的鼓励，同时也寄予了厚望。

王先生热情、平易、亲切、睿智，侃侃而谈中，话题总是自然地转换、连接，作为晚辈没有感到任何压力或担心。此时不禁想起了《清园自述》中王先生回忆与林毓生先生交往的一段描述：“我陡然对他萌生了好感，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由于他在谈论中，所显示的那种处于自然的对人平等的态度，这是许多人不容易做到的。因为那些人往往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使人慑服，对人考量，或向人炫耀的居高临下的态度。……人类的感情是微妙的，你对一个人的好感，往往不是对这个人经过了审慎的衡量或理性分析，而是凭借着他所说的某些具有个性特征的话语，或在他脸上流露出来的某种情绪，它们好像是他心灵的窗口，把他内在的人格全部呈现在你面前，而这一切多半是在你还来不及思考的一瞬间发生的。”这段话好像写的就是我这次拜访的感受。

2005年8月再次去上海时，自然有了再次拜访。抵达上海后，往庆余别墅王先生的房间打电话，没人接听。前一天在拜访何满子先生时，听他说过王先生没离开上海。再打电话到前台一问，才知先生住院了。通过电话探问，得知住瑞金医院9区811床。我们第二天去拜访时，王先生正躺在床上输氧。见我们到了，马上拔了输氧管，坐起来聊天。

王先生谈到当年《随笔》第四期，认为刊物办得不错，有勇气，内容上还有一些新变化；文章有力度，而且推出了一些新人。他特别提到何兆武先生第四期上发表的《纪念清华国学研究院八十周年感言》，国学研究院短短四年，导师四位，学生先后不过百人，其成绩支撑了文化转型时期我国精神文明与学术思想的半壁河山。当谈及文中感叹羡慕现在的学者有条件可以认真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工作时，我提起了多次听何先生说过的一句话：“这一辈子都在打杂，没有完整的时间做自己的事。”王先生接话道：“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这是时代的问题。我们这一代人始终被各种运动、任务、工作驱遣，不能尽心做学问。”

因为口述自传在当时颇流行，我问王先生有没有想过写一本口述自传。他说做过，但没法做成，失败得很。最近香港凤凰电视台还在约做节目，婉谢了。“他们说我口才不错，为什么不做？因为我的口述变成文字后，很糟糕，很不堪。我个人对文字的要求很高，喜简朴，不尚华丽。而我是个笨人，写的文章在人家看来不错，很流畅，但我从来都不是一气呵成，而是反复改出来的。当然有时写一个什么长文，会有顺畅的时候，但总的说来是反复修改的结果。做文章前，先要定调，高了低了，唱起来就会走样，而要定准调不容易。我眼睛右眼失明，左眼能看一点点，根本不能阅读。试过几次口述，做出来都失败得很，我不能忍受，所以只好作罢。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那本《清园自述》，是根据日记整理的。”王先生善解人意，对我们的到访，表示感谢，同时又表示歉意，说现在无法写文章了。但他却将《随笔》放在了心上。不久之

后，王先生的助手蓝云女士用电子邮件给我们发来了两篇稿件，发表在当年第六期：《谈老年之爱（外一篇）》。

与王先生的接触，对我个人还有另一重影响。“文章不厌百回改”是小时候家父教我们兄妹俩作文时常说的话。但我总觉得，别人的文章好像都是一气呵成。以后的读书和工作，也没有遇到过哪位大家将自己的写作习惯和盘托出。有一次拜访朱健先生，他谈到胡风先生写文章前，总是沐浴更衣，然后静坐思考几天。一旦提笔，几万字，几十万字一气呵成。王元化先生“喜简朴，不尚华丽”的文风和“反复修改”的写作方法让我感到亲切的同时，也增添了写作的自信。

2013年2月

王养冲

2006年，华东师大历史系编了一册王养冲先生百岁华诞献寿文粹《下笔须论二百年》，封面和扉页都使用了我拍的这张照片。熟悉王先生的同学、朋友说，照片将王先生的学者风范和刚柔相济的个性展露无遗，让我很有些成就感。

王养冲先生是法国史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曾任副会长和名誉会长。印象中，他没有给我们1980级开过完整的专业课，大概在老师们轮流执讲的史学理论选修课中，讲过两节，印象不深。1984年大学毕业，我考上郭圣铭先生的研究生，专业方向是西方史学史。读研期间，王先生给我们开了一门课：西方近代社会思想史。于是有机会登堂聆教，较多地接触了先生。

王先生有谦谦君子之风，讲课音调平稳。他讲课是那种平实质朴的方式——轻易不离开讲稿，静心听下来，内容却是特别的充实；略显平淡的授课，有时会因他的一番感慨，几句评论而起微澜，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如谈到“文革”中，他被迫将家里收藏的大量西文书当废纸卖掉，很是心痛，指着我们手里的笔记本说：那些书拿去化了浆，大概都成了你们手里的笔记本也难说。对这个细节，和声学兄的记忆特别深。当时，研究生还有一点特权，可以进入外文书库翻看图书，华东师大的外文旧书多半来自创办于前清的圣约翰大学图书馆和民国时期一些私立大学的图书馆，馆藏丰富。和声兄多次提到，在书库翻阅西文书



时，发现许多图书后面插着的借书卡上，几乎都有王先生的签名，有些专业性强、从来读者寥寥的书后则只有他的签名。这故事可作王先生这番感慨的注脚。

在我看来，先生课堂上随意评点、有感而发的议论是他心灵的一扇窗，由此我们多少可窥见王先生内心世界的一角。记得有一回在介绍一位思想家时，谈到他著作颇丰。王先生忽然话锋一转：他著作等身，而我连等鞋也等不了。

讲这话是在 1985 年。从“献寿文粹”后附的王先生的著译目录看，先生的成果，在这个时候还基本上是论文、讲义、译稿、译件、讲座教材、以翻译组名义出版的译书、未刊行论著等等，尚无一部专著正式出版。

对早岁意气风发，中年备受磨难，古稀之年才学术喷发的王先生来说，不难掂量出这句话的悲凉。

王先生 1907 年出生在江苏省南汇县（今属上海浦东新区）一户贫困人家。读完初小因家境艰难，过了两年才得以升入高小，毕业后还是被迫辍学。他不仅天资聪颖，而且勤奋刻苦，据说，跟翻译大家傅雷是同学，班上考试，常常是他第一，傅雷第二（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傅雷家书》流行，这个故事在同学中流传）。成绩出众，特别是国文基础扎实，写得一手好文章。从十五岁起到小学任教贴补家用。在“五四”精神影响下，开始撰文针砭时弊，颇得关注，二十一岁被推荐为胡汉民（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的私人秘书。可谓少年得志。

1936 年，胡汉民病逝后王先生赴巴黎求学，1941 年获巴黎大学文科博士。旅居巴黎十年，博览群书，通晓了法语、德语，并能熟练运用英语等多种语言，在西方哲学、历史等领域涉猎颇深。抗战胜利后，回国任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49 年后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受到严厉批判。1952 年院系调整，调任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1957 年的“反右”逃过一劫，1958 年的“反右补课”仍没能幸免，著述不能出版、书稿

被退、稿约被废。“文革”中，讲稿丢失，被指派做的翻译工作也无权署名。《拿破仑书信文件集》是仅剩的私货，在“文革”后方署名出版。1979年得到平反，虽时年已过七十岁，长期被压抑的研究写作热情终于迸发，有分量的论文如：1979年的《拿破仑研究的演进》《关于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分期的若干问题》；1982年的《论法国大革命编纂学中的进步传统》；1984年的《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等接二连三发表，但专著的出版还要到十多年之后。1996年，他解放初期曾讲授过，三十多年后重执教鞭又再次讲授的《西方近代社会学思想的演进》方正式出版。主编的《法国大革命史》也在2006年问世。

王先生胸怀大志，却因生命的前四十年国破家危，时局动荡而漂流异国；后又三十年折腾不断，才华不得施展。淡淡的一句“著作不能等鞋”，倾泻的是先生心中强烈的苦楚和伤感。

毕业后，一直想拜访王先生，总未能如愿。2005年，通过王先生的哲嗣令渝兄安排，看望了先生。那天，令渝兄把我让进客厅后，没敢贸然打扰，我们坐着聊天。先生知道我到了，拄着拐杖从内屋穿过走廊来到客厅。我提出拍照要求后，先生按我的指引从容入座，两眼望着镜头。后来，我看到王先生各年代的照片，任胡汉民私人秘书时、获巴黎大学文科博士学位时，在上海做复旦大学教授时，以及八十九岁留下的标准照，这目光、这眼神一以贯之，坚韧、自信、沉着。

2013年11月